

土地改革後的中國農村

陳榕甫編著



行印社版出化文經通

土地改革後的中國農村目錄

前言	一
一 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三
二 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	八
三 初步掌握科學技術	一五
四 改進中的生產工具	二〇
五 『組織起來』	二五
六 荒地變良田	三二
七 擴大再生產	三五
八 爲工業化開路	四一
九 豐衣足食住新房	五〇

一〇	政治覺悟大提高·····	五六
一一	需要自己有文化·····	六〇
一二	新的社會新的生活·····	六五

前言

毛主席說，解放戰爭和土地改革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內的兩個關。戰爭一關基本上已經過去了，這一關過得很好；現在是要過土改一關，希望和過戰爭關一樣過得好。

土地改革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一次最大最徹底的改革』。牠的基本內容，就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牠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就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

截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土地改革法公布時為止，全中國已經有大約一億四千五百萬農業人口（總人口約一億六千萬）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還有大約二億六千四百萬農業人口（總人口約三億一千萬）的地區沒有進行土地改革。中央人民政府準備從一九五〇年冬季起，在兩年半到三年內，基本上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

這本書的內容，便是介紹已經完成土地改革地區的農村社會情形；特別着重介紹完成土改時間較早的老解放區如東北、華北等地區的情形。從這些情形可以看出：土地改革是怎樣最徹底的剷除了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是怎樣最大限度的動員了廣大農民羣衆的積極性，是怎樣改變了農村的面貌，是怎樣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創設了條件。

我們十分希望通過這本書內具體事實的敘述，更增強大家對於土改工作的信心，幫助大家過好土改這一關。也希望用這些具體事實，說服和駁倒一切反對和懷疑土改的人。

在寫這本書之前，曾經費過極多的時間搜集各方面的材料，雖然多少有了一些成績，但我們並不認為滿意。我們急切期待著廣大的讀者諸君供給我們以更全面、更典型、更詳盡的材料，當在再版時加以增訂。又本書所收材料，截至一九五〇年九月為止，現正繼續搜集新的材料，以便在再版時補充進去。

一 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歷來中國的土地制度就是極不合理的。就舊中國一般的土地情況來說，大約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佔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農、貧農、雇農和其他人民，却總共只佔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又據概略統計，大約鄉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由中農、貧農和一部分雇農耕種的（還有百分之十的土地由富農自耕），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屬於他們自己所有，大部分土地都是由地主和一部分富農出租給他們的。

農民承租地主的土地，一般繳給地主的地租，要佔到收穫物的一半，再加上各種額外剝削，實際上地主攫奪了農民收穫物的一半以上；因而農民終年勞動，不得溫飽，但地主們却過着窮奢極慾的寄生生活。

這種情況是十分嚴重的。這種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就是我們民族被侵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後的根源，是我們國家民主化、工業化、獨立、統一及富強的基本障礙』。在今天講來，『這種情況如果不加改變，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就不能鞏固，農村生產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國的工業化就沒有實現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勝利的基本的果實』。

怎樣改變這種情況呢？那就是要實行土地改革；要『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

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也就是要實現『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的理由和目的，就在『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必須依靠國內廣大的農村市場，沒有一個澈底的土地改革，就不能實現新中國的工業化』。

中國的土地改革，已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遠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江西蘇區的土地改革，曾在毛主席領導之下，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到抗日戰爭以後，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國共產黨發布土地問題的指示，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又公布了土地法大綱，先後在各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截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土地改革法公布時為止，在全國範圍內有約一億四千五百萬農業人口（總人口約一億六千萬）的地區，已經完成或在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

東北區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這一年中，在大部分地區展開了土地改革工作，到一九四八年春天就已在基本上完成；等到這年冬天東北全境解放以後，土改工作很快的就在新區順利結束了。

華北區山西、河北、察哈爾、平原等四省大部分，有約五千四百萬農業人口的地區，先後在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九年冬這幾個冬季裏，完成了土改工作。

西北區陝西省北部，是抗日戰爭時代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所在地，那裏的土地改革在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就已經完成。還有黃龍專區也在一九五

○年春天完成了土改工作。

中南區河南省也已有四十三縣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完成了土改工作。

華東區有約四千五百萬農業人口的地區，已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前後完成或是曾經進行過土地改革，計山東省有三千二百萬農業人口的地區，蘇北有一千萬農業人口的地區，皖北有三百萬農業人口的地區。

關於分配土地的實際情形，這裏舉北京和天津市郊爲例：北京郊區包括二百八十八個村莊，耕地共約一百〇九萬七千五百餘畝，地主和富農佔有的約佔總面積的二分之一。在一九四九年冬到一九五〇年春的土地改革中，沒收了地主的土地和徵收了富農出租的土地，共計四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畝。這些土地除地權全部收歸國有外（大城市郊區土地，地權均全部收歸國家所有，至於一般農村土地，在土改後屬於農民所有），都已適當的分配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使用。沒有生活來源的地主，只要他願意從事農業勞動，也分給他同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又沒收了地主的農具六萬六千八百〇四件，水車和大車二千二百七十九輛，耕畜一千七百四十三頭，和多餘的糧食一百三十三萬多斤，徵收了地主多餘的房屋二萬二千二百七十八間。這些東西，也都根據農民的需要，採取自報公議的方式，分給了農民。計分得土地和農具等生產資料的農家，共爲五萬二千〇九戶，二十一萬七千〇九十一人，佔全郊區農業人口百分之六十二。

天津郊區包括六十七個村莊，共有耕地十五萬六千三百十三畝，人口十四萬三千二百人。在土地改革前，地主和富農佔有的耕地約佔百分之五十四左右，加上工商業資本家和社團、教堂出租的土地，竟要佔到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七左右。在一九五〇年春土地改革中，沒收和徵收的土地，共計十萬六千〇十畝。這些土地在收歸國有後，即連前原有的公地六千餘畝，全部分配給郊區的貧農、雇農和一部分無法維持生活並願意從事農業生產的貧民、小手工業者與失業工人使用。

根據華北山西省太行山區的統計，土地改革後農村生產關係的變化是這樣的：地主的土地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四，經營地主的土地減少了百分之八十八，富農的土地減少了百分之七十四，中農的土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貧農的土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在這個統計裏，中農增加的比例數字反而比貧農大，這是因為許多貧農都已上升為中農的緣故。

以上所舉的是在某一個較大的地區內的整個統計數字，這裏再拿蘇北的兩個小村莊作例，更具體的說明個別小地區分配土地的情形：蘇北葉挺縣（原鹽城縣）的柏家村，在土改前共有五十八戶，二百九十八口，有田地八百七十八畝；大部分田地都為地主所有。有地主兩戶共十一口，就佔有田地二百八十畝，平均每口佔田地二十五畝多些。有雇農、貧農四十二戶共二百二十口，却只佔有田地一百九十一畝，平均每口佔田地不足九分。因此除富農、中農的田地夠自己耕種以外，貧、雇農是不夠自種的。

，他們只得租種兩戶地主的田地和富農的一部分田地；每年收穫糧食除了繳納地租以外，剩下來的不夠維持最低生活。自從一九四六年秋季實行土改之後，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每口分得了三畝田地左右，還分得了風車、洋車、耕牛和房屋等。如農民張懷仁家原只有一畝多田，農具一無所有，土改後分得了十三畝好田、半部洋車、三間新房屋；陳連章全家七口，過去只有六畝田，糧食每年不夠吃，有人力沒田地耕種，土改後分得了水田二十一畝和四分之一部風車。

蘇北如東縣（新設縣，在如皋東面）桐本區的王長村，在土改前有二百五十戶，九百七十七人，有田地二千八百八十八畝。佔人口百分之八不到的地主、富農，佔有田地的百分之七十四；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二的雇農、貧農、中農，却只佔有田地百分之二十六。一九四六年實行土改之後，全村有一千六百九十六畝田地，從地主手裏拿出來，分給貧、雇農，每個人從只有八分田增加到有三畝田。

從這些數字看來，實行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地主階級已經消滅，封建剝削已經剷除，農民們從地主手裏分得了土地之後，第一次當了土地的主人。

二 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

土地改革後，農村中的生產關係起了根本的變化，生產力在新的生產關係下得到飛躍的發展。——在農民們當了土地的主人之後，很自然的使用全副力量來耕種自己的土地。農民的生產情緒是空前的高漲，農業生產量是大大的增加了。

遼東省寬甸縣羅圈夾村的農民，在一九五〇年七月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九週年的時候，寫給毛主席一封信，報告土改後的情況。信裏說：『……在一九四七年年底，我們村裏完成了土地改革。過去我們是在別人的土地上出力，現在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過去是一個肩給地主扛着飯碗，現在勞動果實完全爲自己所得了。這樣，我們生產的勁頭怎能不大呢？我們生活上升的怎會慢呢？你看看吧！親愛的毛主席，土地產量已經超過了一九四二年，在一九四二年，每畝地平均只能產二百三十斤糧食，去年每畝地產了三百多斤。……』

在北滿草原上的農民們，都說土地改革後連地氣也變了。拿黑龍江省肇源縣農業勞動英雄王振堂住的四合屯說吧，一九四七年，七十二垧地（每垧面積一萬平方公尺、約合十五畝），收了一百七十九石糧食（每石五百斤）；第二年還是那些地，却收了四百八十石；一九四九年雖說遭了大旱災，『年景差老鼻子啦！』但還是收的比上年多，打了五百一十石糧食。給地主作了三十二年長工的王振堂對這事摸的最清楚。他

說原先是給地主幹活，成年的拚死拚活，到頭來還是挨凍受餓，種田也就懶了性啦！如今多收一顆自己多得一顆，誰全使滿勁的往前幹。再拿黑龍江全省來說，在一九四七年每垧地平均產糧一千五百斤，次年產一千八百斤，一九四九年雖鬧旱災，仍提高到二千斤的產量。這都是農民們多剗（鋤草）多踏（培土）、精耕細作的結果。

山西省太行山區早在一九四六年就完成了土地改革，那是曾經日本侵略軍燒殺掠奪過多次的地方，但在戰後農業生產發展得最快，現在同樣一畝田地，產量超過戰前平常年景近一倍的例子，已不算奇蹟。平順縣西溝村戰前每畝產量一担三斗，一九四九年爲兩担一斗；壺關縣十里村戰前每畝產量一担二斗八升，一九四九年爲兩担六斗；黎城縣霍家窰戰前每畝產量一担，一九四九年爲一担九斗；潞城縣魏家莊戰前每畝產量六斗到九斗，一九四九年爲一担一斗；由於秋天缺雨，一九四九年還是一個歉收的年景。

新華社記者報導過一個令人激動的故事：山西省平順縣有一個農民，當最初分配到土地的時候，曾在深夜裏帶領全家打着燈籠一塊一塊的去撫摸着那從來不屬於自己的土地。這一種強烈的生活慾望和空前未有的生產熱情，從廣大農民中普遍生長起來，他們用盡一切辦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加工。『我要牠窮山變富山』！『我要牠窮溝變富溝』！這聲音響徹過太行山區。

再拿個人的生產情形來說，平順縣川底村郭懷慶租種了三畝地，一九三七年每畝

收一担七斗糧食，一九四三、四四年，由於實行減租政策，生產情緒提高，每畝收三担，一九四五年每畝收三担二斗，一九四六年更因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每畝收四担六斗；和戰前相比較，生產量已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七十。黎城縣霍家窰勞動英雄石寸金種四畝四分地，從前是地主所有的，每畝頂好能收七、八斗糧食，一九四九年石寸金却收了十六担糧食。潞城縣五里堠村東南有一塊十畝大的耕地，在地主王承烈佔有時，每畝常年產糧一百六十五斤；日寇統治時降低到一百〇五斤；戰前的最高產量也不過二百二十五斤。這塊地在土地改革時分給貧農王孔則後，產量年年上漲，一九四八年就達到了戰前水平，一九四九年每畝產到三百斤；一九五〇年如果沒有想不到的災害，保證每畝收糧三百七十五斤，超過戰前最高產量一百五十斤。據王孔則自己說，這塊地剛分給他的時候，蒿草長的埋了人；全靠他精耕細作，加工加肥，犁、鋤、耙各三遍，施肥由過去三十担增加到八十担，下種時還用水銀劑拌種，這才把荒地種活。

在北京市郊，往年大秋作物播種前，地只犁一遍；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後大部翻了二犁。麥地一般不鋤，土改後普遍鋤了一遍；大秋作物一般都是麥後才鋤二遍，土改後麥前已鋤過二遍。農民大家比賽着把工夫下到地裏，知道地不虧人。

山東省文登縣的富貴村，過去全村只有深創地百分之五，土改後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過去無冬耕習慣，現在冬耕地佔百分之二十七；過去小麥鋤一遍，苞米鋤五

遍，現在小麥鋤兩、三遍，苞米鋤八、九遍。

蘇北葉挺縣小橋村新溝邦翻身農民胥朝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十畝六分田；本來田底很差，土改前每季一畝只打糧食二百斤左右，經他多耕多墾，在一九四九年秋季每畝收了三五百多斤。喬玉樓一家八口，土改後分得了二十多畝田，生產情緒很高，七十餘歲的老爹爹也積極下田幫助做活，由於精耕細作、加工加肥的結果，一九四八和四九年秋季每畝比過去增產稻子一百多斤。全舍各戶農民在『生產致富、勞動興家』的號召下，產量都比過去提高。一九四九年秋收統計，一百三十一畝麥田，除有三十餘畝每畝收二百二十多斤外，其餘都收有三百斤以上，平均每畝比過去增產了五十斤左右；如葛德順家五畝麥田就收二千一百多斤。水田一百九十五畝，收到四百斤左右的有五十多畝，其餘則都是收三百斤左右。再有葉挺縣的柏家村，戰前有麥田七百七十六畝，平均每畝收一百一十多斤，共收糧八萬五千四百七十斤；由於土改後兩年來的努力增產，在一九四九年就收了九萬二千二百六十斤，一九五〇年全村共有七百四十六畝麥田在響應增產一成的號召下，共收糧十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六斤，比戰前超過兩成多些。

土改後的農民們，一面在自己的土地上加工，同時還在土地上加肥；這就更增加了糧食的產量。據山西省壺關縣五個村的調查，抗戰前每畝土地的施肥量為四十三担，一九四九年增加到五十五担。又據左權縣（原遼縣）四個村的調查，抗戰前每畝土

地平均施肥二十九担，現在施肥五十五担，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九。平順縣西溝村的農民，以前在租來的土地上每畝每年只能施肥二十担和鋤兩遍草，現在每畝施肥在一百担以上，鋤草多至四、五遍。太原市郊區小麥溝村，抗戰前每畝施肥三十担，現在每畝施肥四十担，生產一向有基礎的嘉節、楊家堡等村，平均每畝施肥六十担。

施肥技術也有改進；在施肥時，不光是大量加肥，而且做到什麼樣的地施什麼樣的肥。據山西省沁源縣城關霍鎮柱、張來貴兩個互助組集體研究試驗的結果：灰肥和驢馬糞發暖，宜上發冷帶粘性的下濕地；圈肥發涼，宜上平旱地；蒿肥性平，宜上平沙地。這樣不但使糧食產量增加，而且籽粒飽滿。

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剛完成土地改革的北京郊區，農田施肥量也比往年多得多了。當土改還在進行時，農民們就開始準備肥料；北京市內通往四郊的大道上，一直沒斷過拉爐灰、溝泥的大車，有的農民甚至日夜不停的拉；每天大早起來拾糞的人，各村都有增加。加以市人民政府大量發放肥料貸款，幫助農民購買肥料。因此一九五〇年普遍比往年多施了肥；如辛四村共三千〇十一畝地，往年只上五、六千車糞，平均每畝兩車；一九五〇年上糞將近一萬車，平均每畝三車半。往年一般麥地不抓青苗糞，一九五〇年大部麥田都上了底溝子糞，苗了青。往年農民自己的地上兩車糞，租地主的地只上一車，現在不論是自己的地或使用國家的地，都是一樣施肥了。

陝西省的黃龍專區，據統計一九五〇年有百分之六十的秋田，施肥比土改前增加

一倍，而且都作到了精耕細作，耕鋤三遍。

河南省已完成土改地區，一九五〇年春季普遍作到犁耙兩遍；臨汝等縣施肥由每畝三車糞增至五車；襄城縣大部分田地都追加春肥；在葉縣更掀起挖河積肥運動，七區東莊一村就挖臭泥積肥一萬多車。

山東省文登縣富貴村的農民，土改後特別注意對土地的施肥，積極從各方面增加肥料，製『人造尿』、『瀝綠肥』、『積乾灰』……，已在全村推廣起來，因此施肥量大增。據一九四九年統計，全村一千〇三畝地，全年共上糞一萬五千餘車，平均每畝十五車，比翻身前增加兩倍，此外並施豆餅等追肥八千餘斤。老農倪培松高興的說：『早先連豆餅都吃不上，要不是毛主席的領導翻身，生產發家，那能把豆餅當糞用』。據新聞報導，在一九五〇年萊陽區的農民，又較一九四九年每畝普遍多施肥二百餘斤。

蘇北淮安縣石塘區的農田施肥量不但超過往年，而且超過了一九五〇年增產計劃中的一般要求。往年稻麥田每畝施肥約二十担糞，旱田每畝八、九小車，增產計劃中要求稻麥田每畝二十二担糞，旱田每畝十二、三小車；而全區稻麥田每畝實際施肥到二十三担糞以上，其中並有大部份田地每畝施肥到三十五担至五十担糞。每天早上天還沒有明亮，就有成羣結隊的人到淮安城內挑糞回家；中午時淮安城東邊、南邊大路上的糞担子更是絡繹不絕。如東縣在一九五〇年開展了積肥運動，春田和麥田的施肥

量均較以往任何一年爲多；每畝春田平均施肥達十多担，麥地施肥也普遍由一次增至兩次。全縣已消滅了種田不施肥的現象。拿桐本區的王長村爲例，全村二千八百八十八畝田，在一九四五年全年用肥一萬五千七百餘担，一九五〇年耕麥田施肥即達四萬三千多担。過去很少鋤草，現在普遍鋤了二遍到三遍。雖然一九五〇年麥熟時遭受到風雨的災害，但大致還能保持一九四九年水平；每個農民都說：『要不是今年多鋤草，多施肥，麥還要少收呢！』